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古巴史

理查德·戈特 著 徐家玲 译

CUBA A New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古巴史

理查德·戈特 著 徐家玲 译

CUBA A New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 - 2011 - 0510

CUBA: A NEW HISTORY

by

RICHARD GOTT

Copyright: © 2004 BY RICHARD GO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巴史/(英)戈特著;徐家玲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00 - 9198 - 1

(世界历史文库)

I. ①古… II. ①戈… ②徐… III. ①古巴—历史 IV. ①K7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633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倪亮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学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鸣 谢

这本在古巴写作的书，若没有古巴驻英国大使何塞·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罗德里格斯（José Fernandez de Cossio Rodríguez）和新闻参赞勒内·蒙佐特（Rene Monzote）的慷慨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友好的关切，开放了许多渠道，还帮我争取到了对许多政府要员的采访。我最初是在1963年带着休·托马斯（Hugh Thomas）的介绍信到达哈瓦那的。数年后，我带着从他的女儿贝拉（Bella）那里得到的另一份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名单踏上了归途。我对他们所给予的所有同事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古巴的这些年，我得到了我的老朋友帕布洛·阿曼多·费尔南德斯（Pablo Armando Fernández）和他的妻子马鲁嘉（Maruja）的关照，同他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费尔·阿吉（Phil Agee）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从一个美国中情局（CIA）特工变成了一个旅行代理”的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乐天派，同时也是美国—古巴交流的促进者。在研究古巴的历史时，我受到了一批经常在中世纪修士般的条件下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的历史学家们的影响，他们是：豪尔赫·伊巴拉（Jorge Ibarra）、菲·伊戈勒西阿斯（Fé Iglesias）、吉列尔莫·希门尼斯（Guillermo Jiménez）、费尔南多·马丁涅斯（Fernando Martínez）、欧尔佳·波图翁多（Olga Portuondo）和埃德华多·托莱斯-格瓦斯

(Eduardo Torres - Cuevas)，他们在不同的方面给予我相应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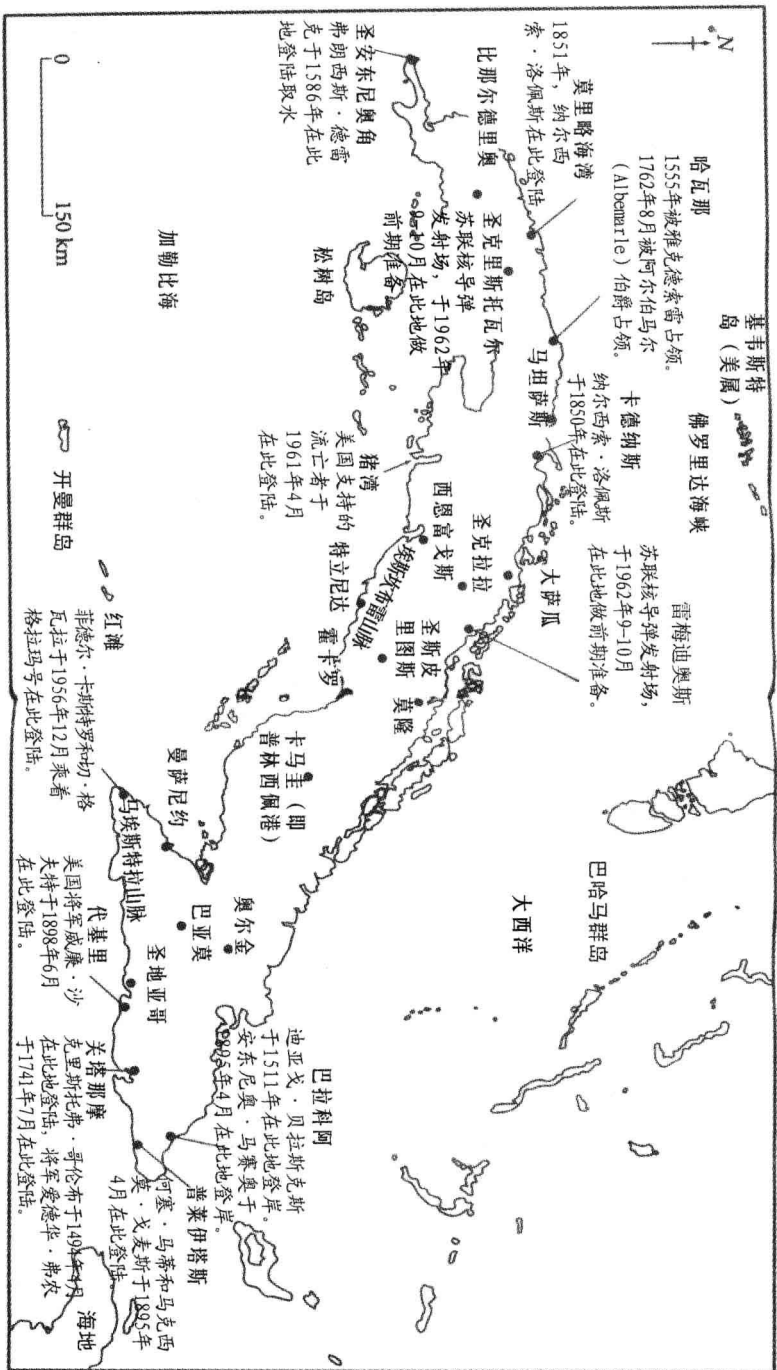
在伦敦，我得到了玛丽·图尔内（Mary Turner）的帮助，她经常给我提出有益的建议；艾米莉·莫里斯（Emily Morris）则在古巴经济方面给予我指导；维多利亚·布里廷（Victoria Brittain）给我提供非洲方面的知识；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曾与我进行的关于古巴的谈话使我受益终身。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阿利斯泰尔·亨内西（Alistair Hennessy）、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托尼·卡普西亚（Tony Kapcia）、哈尔·克莱帕克（Hal Klepak）和让·斯塔布斯（Jean Stubbs），都有意无意地给了我启发和鼓励。同时，马克西米利·阿沃莱伊斯（Maximilien Arvelaiz）重新唤起了我对现代拉丁美洲史的兴趣。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亚当·弗洛德海姆（Adam Freudenheim，现就职于企鹅出版社）最先提出了关于这本书的设想，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积极自信的编辑。十分荣幸的是，独具慧眼的桑迪·查普曼（Sandy Chapman）成为了我的终审编辑。和善的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院院长詹姆斯·邓克利（James Dunkerley）对我的初稿提出过周到缜密的意见，对此我不胜感激。

我的妻子费雯·阿什利（Vivien Ashley）在古巴之旅中一直激励着我，陪伴着我，我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同时也对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Chelsea & Westminster）医院内视镜室的杰里米·汤普森（Jeremy Thompson）及其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帮助我熬过了一段漫长而困难的时光。

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

伦敦和哈瓦那，2004年



序 言

1963年10月，我第一次造访古巴。当时，时常鞭笞加勒比海的大飓风刚从这座岛屿的中心和东部横扫而过。弗洛拉（Hutticane Flora）飓风摧毁了咖啡作物，毁灭了田地和农庄，毁坏了公路、铁路和桥梁，并且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同时也像一个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总督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担负起了救援工作。在每个夜晚的电视节目里，他都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抵御洪水的斗争，鼓励其饱受磨难的人民：“革命的力量比自然更加强大。”我在那个时候还经历过另外一件不幸的事件，是在圣伊莎贝尔德拉斯拉哈斯（Santa Isabel de Las Lajas）举行的“节奏之王”贝尼·摩尔（Beny Moré）的葬礼。他是一名歌唱家，直到今天他仍被公认为是古巴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他的灵柩被一队士兵抬着，数以千计的送葬者挤满了乡村的街道。

那时的哈瓦那仍旧是一个富有且繁华的首都。它那殖民时代的建筑虽然已被夷为平地，但是它广阔的郊区——那里的小宫殿中挤满了享有政府津贴的乡下孩子——与美国南部那些引人注目的城市相比，别无二致。色彩鲜艳且富于想象力的招贴画仍然在醒目地宣传革命，据说是由美国的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广告公司（其在哈瓦那的分部已经完全投向革命）的平面设计师设计的。对于一个来自于

堕落、颓废并且仍然受到战争蹂躏的欧洲的来访者来说，“共产主义”的古巴比它残存的资本主义的虚饰外表更有吸引力。我为伦敦的左翼周刊《论坛报》（Tribune）有所保留地记录下了我的第一印象：

2 现在古巴革命即将进入第六个年头，令人咋舌的自信仍反映在革命的每个方面。许多事情可能会使人们对古巴心存不满，但是人们永远不能否认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这场革命仍然广受欢迎。中央集权统治的这五年，是激情大于其控制能力的五年；是充分认识到自我错误的五年；是美国敌意不断增长，直至以现在的封锁为顶点的五年；是资源匮乏日益严重的五年。所有这些，没有一样真正减弱了古巴革命的热情，或者有损于它的吸引力。

在那个年代，乘坐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英国造涡轮螺旋桨式子爵型飞机，从欧洲飞到古巴需要 24 小时，途经中部大西洋，在沿途的大部分岛屿起降。我去古巴时随身带着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的两本著作——所有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经济学家都要阅读的著作，还有一小块装在瓷罐里的斯提尔顿奶酪。

这块奶酪购于伦敦男人街（杰明街）的一家颇有名气的奶酪店——帕克斯顿和惠特菲尔德奶酪店（Paxton and Whitfield），是我的一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智利同事克劳迪奥·维利茨（Claudio Véliz）送给我的，他在那里负责拉丁美洲项目。在刚刚访问哈瓦那返回后，克劳迪奥认为，一块斯提尔顿的熟奶酪是送给古巴共产党的幕后智囊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最为合适的礼物。那一代的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者们（罗德里格斯于 1943 年加入巴蒂斯塔的内阁）都有着资产阶级的爱好，就像后来我从帕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那位智利诗人那里发现的。他享受着崇拜者对他所表示的敬意，即成箱的威士忌和罐装的鱼子酱。

哈瓦那机场的官员们对斯提尔顿奶酪表现得十分紧张和谨慎，他

们用织针去刺它，以确认它不是一枚炸弹。紧随失败的猪湾入侵之后，美国筹划的旨在破坏古巴政权的“猫鼬行动”最近已经被放弃，但是迈阿密的流亡团体对这座岛屿的恐怖袭击仍旧频繁发生。据之后由美国中情局公开的一则报告称，在11月，也就是我来此的一个月后，一名间谍在巴黎将一支钢笔枪交给了古巴的联络人，以使用它来暗杀卡斯特罗——就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枪击的当天。所以说，古巴人对待那些不速之客携带的礼物持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哈瓦那的那段时间里，维利茨委托当时的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季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撰写文章。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接收他的手稿。我被介绍给多位在格瓦拉的经济部工作的拉丁美洲人，不久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就能够在这座岛屿上游历，近距离地观察革命，同时等待一个与格瓦拉会面的机会。

我驱车前往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io），坐飞机前往圣地亚哥，然后在马埃斯特腊的群山中穿行，去探访卡斯特罗原来的游击队营地。哈瓦那通往圣地亚哥的道路被洪灾阻塞，想要从这座城市出行，只能依靠一辆苏联赠送的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回到哈瓦那，在我入住的宾馆门口，我看到卡斯特罗正从车里出来，于是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聆听他在革命广场集会上的讲话。我与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Antonio Nunez Jimenez）进行了面谈，他是游击战的专家，曾经为格瓦拉介绍过有关古巴独特的地理地势问题。我与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会过面，他是一个来自激进家庭的古巴黑人诗人，最后我终于能够在我们进一步讨论最新的农业改革——这一个小时中我们谈论的令人兴奋的话题——之前将那块现在多少有些潮气的斯提尔顿奶酪送给卡洛斯·拉斐尔。我甚至为格瓦拉的部里那些满心疑惑的官员们做了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讲座。

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我才见到了格瓦拉本人。我被带到了在一个在苏联大使馆花园中举办的招待会上，那是一个例行的外交庆典，每年都会举办，以庆祝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受邀的古巴人因新奇而兴

奋不已。午夜之后，格瓦拉在一个由朋友、保镖、随行人员组成的小团体的陪伴下，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贝雷帽，穿着敞开到腰部的衬衣，阔步走进了会场。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在过度仰慕音乐家的时代来临以前，他就已经拥有了摇滚明星般的耀眼光环。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人们都停了下来，只是注视着这位革命的缔造者。“如果他进入一间屋子，所有的事情都会围着他转……”一位有着相似经历的阿根廷记者——朱莉娅·科斯滕拉对正在为格瓦拉传记做访谈的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如是说，“上天赐予他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法估量的魅力。”这是恰如其分的描述。

格瓦拉在世的时候，拥有超凡的吸引力，当他死后成为曼特尼亚^①式的偶像人物及安迪·沃霍尔时代流行音乐招贴画上的一个迷人形象之前很久，就是如此。就像特洛伊的海伦一样，他拥有让人们愿意为他而死的魅力。在哈瓦那的那个温暖的秋夜，他坐在使馆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人们互相介绍，热烈地交谈。我没有记住当时人们所讨论的东西。那时，我仅是一个年轻的、学识浅薄的、略通西班牙语的初涉政海者，如同飞蛾那样——像那些来自欧洲和美洲的数以千计的叛逆者和冒险家一样——被炽烈的革命火焰吸引到古巴来。格瓦拉有些随意地告诉我，他还没有写完我要取走的那篇文章，全文会在几个星期后被邮寄到伦敦去。

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支持卡斯特罗的人（fidelistas）已经掌握政权达五年之久，但是我遇到的在经济部和哈瓦那大学工作的许多人都对革命信心不足。旧秩序显然已经被摧毁了，但是新的时代仍旧迟迟没能到来。在圣地亚哥，我同一名来自东德城市莱比锡的年轻教授进行了交谈，他在早上7点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沮丧地发现，没有一个古巴学生在这个时间能睡醒。但是，作为一名革命的旁观者，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画派代表画家（1431—1506），以其绘制的壁画，特别是人物画而闻名于世。

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本身就具有吸引力，充满希望。古巴人似乎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热情穿上了新的马列主义的外衣。我注意到，我的一位古巴朋友访问了布拉格。他惊讶地发现，卡夫卡（Kafka）居然不是一位民族英雄！即使在革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古巴仍然被允许存在。“让赫鲁晓夫（Khrushchev）皱眉蹙额的抽象艺术在这里繁荣发展”，我写道，“哈瓦那的所有家庭都能够收看《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①。”在五年的剧烈动荡之后，未来革命将如何发展看起来仍是一片空白，而这张白纸如今即将被书写。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同切·格瓦拉见过面——尽管在四年后的10月，我非常突然地看到了他的遗体。1967年10月，一个星期一的下午5点，当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时，我正在玻利维亚山城瓦里格兰德（Vallegrande）的机场，直升机的起落架处用绑带固定了一个担架。几小时前，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高层下令枪决了。由于前一天晚上一名在圣克鲁兹（Santa Cruz）附近军事训练团中工作的美国官员透露了格瓦拉被俘的消息，我连夜驱车数个小时赶往玻利维亚军方的前方基地瓦里格兰德。在那里，一名紧张不安的指挥官告诉我，不准许继续前往拉伊格拉（La Higuera），这个位于前方的村庄就是格瓦拉被关押的地方。那个年代的玻利维亚，在没有军事许可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从城镇里外出的。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瓦里格兰德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飞机场，直升机到达后，格瓦拉的遗体被转移到了一辆小型雪佛兰货车上。这辆货车驶离机场，进入城镇，转进了当地的一家小医院。格瓦拉被放置于一个露天洗衣场的平底水池上。这次行动是在美国中情局的一名负责古巴—美洲事务的特工的控制下实施的，当时我们所知，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是当时在游击区行动的两个特工之一。当我问到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给了个神秘的答复，“哪儿的都不

^① 又译为《露滴牡丹开》，著名导演费里尼的“背叛分部曲”之一，1960年上映，马斯楚安尼、艾克伯格、艾柏等主演。——译者注

是”。在场的人中，唯有我们两个曾在格瓦拉生前见过他，可以证实这就是他本人。

成群的村民涌入了洗衣场的院子中，只为去看一眼死去的格瓦拉，我在人群中停留了半个小时左右，被他那双睁着的让人过目难忘的眼睛所吸引。之后，我经过了整整一晚上 8 小时的长途旅程，乘坐吉普车返回了圣克鲁兹，想办法将这个 message 公之于众。

1967 年，格瓦拉的死终结了許多人同古巴革命的浪漫主义式的联盟，随后的一年，卡斯特罗公开发表尖锐言论，反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并更进一步地正式将古巴革命纳入苏联支持者的阵营中。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在对哈瓦那进行访问，对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历史和斗争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早年对古巴革命的热情，古巴人民及其不懈的斗争经历对我造成的持久影响，还有对他们岛屿的悠久历史持续不断的兴趣。我在 30 年后重返哈瓦那以便将这些记忆写下来。

引言：古巴人民

5

卡萨大酒店（Casa Granda）颇具人气的露台咖啡厅临街而建，俯瞰着位于古巴圣地亚哥城（Santiago de Cuba）中心树木枝繁叶茂的殖民时代的广场。在远方，矗立着一座有着阿拉伯式装潢的古老木制房屋。这座房屋建成于16世纪早期（一些人是这么认为的），目的是纪念这座岛屿的征服者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Diego de Velasquez）。左侧是一座庄重而又现代的20世纪大教堂，右侧则是市议会办公室的阳台，1959年1月2日，即革命的第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在那里对群众进行讲演。

每逢周六，露天咖啡厅里都会挤满了举办“成人礼”（*quinceaños*）的女孩和她们的父母、好友。漂亮的15岁女孩们穿着飘逸的白色衬裙，在此害羞地庆祝她们的生日——同时也是步入成人世界的仪式。这些出场的女孩及其家庭成员高矮不一，身材各异，肤色也不同——有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这种景象是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的重现，但是就像在古巴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它在100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代，想要在城镇的中心看到这种社会上种族大融合的情景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古巴是一个新生的民族。直到卡斯特罗革命之后，古巴的社会才开始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团结和统一的国家。在西班牙帝国主

义者历时数世纪的专横统治下，直到 1898 年之前，古巴的居民都被按照种族、阶级和原籍、裔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历史的显著特征，就是种族暴力、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白人对黑人及所有其他种族的迫害。城镇和大部分乡村中的人都在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征服、反抗、奴隶起义、海盗入侵、失败的独立战争以及失败的革命，这一切似乎都在喘息之间相继发生。直到 1959 年，古巴的政治斗争才被枪炮解决了。19 世纪来此游历的旅行者们经常会记录道，街头根本见不到任何女人。她们被以充分的理由关在家里。^①

- 6 现在的古巴人，大部分是白种人或黑白混血儿，但是在这座岛屿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超过一半的居民是黑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长期以来，黑人和白人的比例变化不大。直到 19 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当局致力于通过鼓励白人移民的方式，来使居民成分“白人化”。此外，这几十年间奴隶的输入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奴隶制仍然被允许存在，但是奴隶贸易是非法的，这些都使得白人的比例日益上升。1886 年，古巴的奴隶制才被正式废除。^②

古巴的黑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来自于遍布在西非漫长海岸线上的，从北部塞内加尔到南部安哥拉的众多部落和民族——甚至还来自非洲东南海岸的莫桑比克。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信仰和音乐。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古巴这个他们被运抵的新家园中，他们都保持着这些差异。为了维护其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黑人社团和救助社保持了他们的特性。

第一批黑人奴隶是随着 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浪潮到来的，他们被安置在金矿和铜矿中工作，之后则是烟草农场。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多数黑人奴隶在甘蔗园中生活和劳动，其他人则是作为家中的佣人。但是，黑人中的许多人——虽然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数量不断变化，

^① Luis Martínez-Fernández, “Life in a ‘Male City’ Native and Foreign Elite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Havana”, *Cuba Studies*, vol. 25, 1995.

^② 在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奴隶制的终结要早得多，集中在 1834 年到 1848 年间。在美国，它终结于 1863 年；在巴西，它终结于 1888 年。